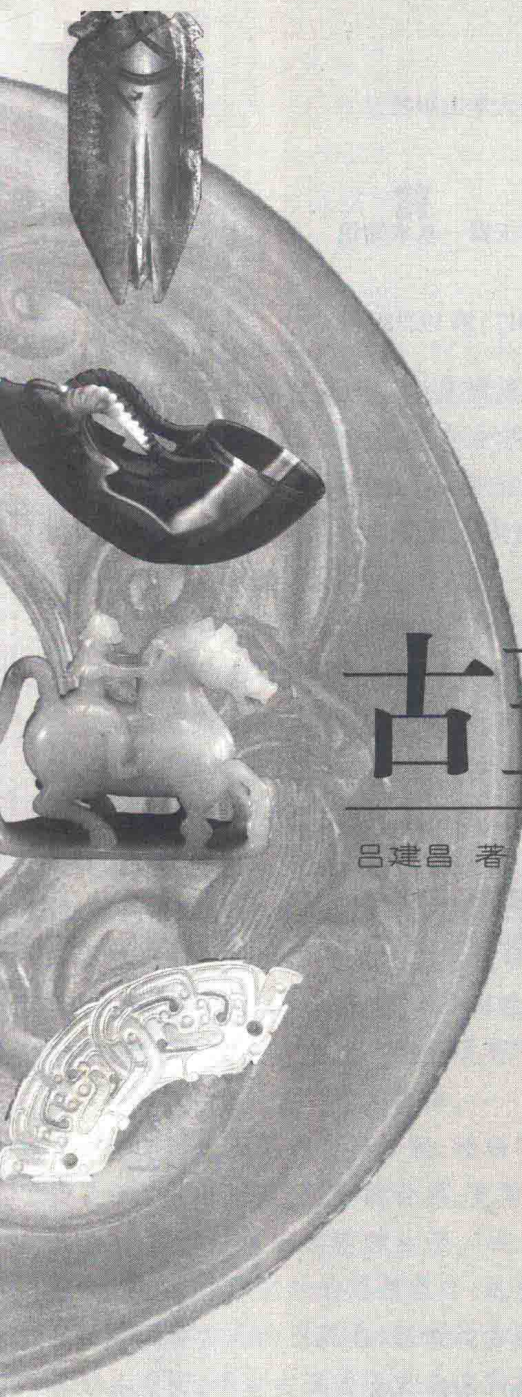




古玉新识

吕建昌 著

出版社



古玉新识

吕建昌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玉新识/吕建昌著.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71-2900-9

I. ①古… II. ①吕… III. ①古玉器—基本知识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2389 号

责任编辑 黄晓彦
美术编辑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书 名 古玉新识
著 者 吕建昌
出版发行 上海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邮政编码:200444)
网 址 <http://www.press.shu.edu.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 版 人 戴骏豪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5
插 页 8
字 数 15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1-2900-9/K · 168
定 价 30.00 元

前 言

本书所写内容是我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玉文化的结果，其中的有些观点已写成论文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由于学术论文的写作需要严谨性和科学性，社会上一般读者对学术味道较浓厚的论文兴趣不大，本次成书本着深入浅出的编写原则，希望读者阅读起来不至于感到生涩难解。

我清楚自己的知识面和研究能力有限，所涉及范围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玉器的前段，即从史前时代到汉代，隋唐以后则不作为重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局动荡，战乱纷纷，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玄学应运而生，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外来文化进入中原，传统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玉文化发展走向“弃儒从道”之路，古玉的生产制作进入历史低潮。从六朝开始，伴随着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入和儒道释的合流进程，中国古代玉器原有的神秘性逐渐消退。到隋唐以后，尽管有部分玉器出于封建统治的需要，依然保持着“礼”的性质，为维持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服务，但玉器发展的主流已完全脱离“神”与“权”的关系，走下神坛，进入民间，成为世俗文化的载体。

史前时代玉器的奇异形制、神秘纹饰以及精美的雕琢工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遥远、陌生的世界；史前先民们用玉器表现出他们那充满崇拜、激情和灵感的精神生活。进入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以后，古玉依然带有许多当时的思想理念，这些距离今天的生活相去甚远，故有必要阐释古人的玉观念，以透过古玉看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明白古玉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本书中的第二、第三章都是围绕这一主题。

古玉器的鉴定,从有玉器收藏开始就已出现。早先的方法都是凭肉眼观察或掂分量等“经验法”,鉴定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对古玉器作出年代及真伪的判断。在古玉造假十分猖獗的今天,造假者不断创新其作伪手法,加之琢玉技术设备的进步,高仿真的古玉足以达到“乱真”的水平。光凭传统的“经验法”鉴定古玉,难以保证在鉴定中不出现失误,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为古玉器的鉴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条件。因此,我认为“经验法”与科学技术检测方法两者结合,才是古玉鉴定的理想方法。本书中第四章有关于玉质的现代科学技术检测介绍,希望读者能了解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检测玉材的原理及其特点,对玉质的辨别有所帮助。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古玉器面世,蔚为大观,为古玉器鉴定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标准器。不同时代的古玉器造型、纹饰与艺术风格以及工艺等特征,都可通过与考古出土的古玉器比较而辨识,而现代科技检测技术则能够从古玉的材质与雕琢工艺方面为玉器的真伪鉴定保驾护航。这是古玉鉴定方法的一个发展方向。本书在这方面做了探讨,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以便在收藏中有实用意义。

由于本书编写体例的关系,有些内容无法纳入整个章节体系中,所以附录部分另附上三篇相关的论文,作为对本书内容阐述不全面的补充。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本书的出版获得上海大学历史系高原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这里一并感谢院系各级领导及同事对本书出版的关心与支持。

作者

2017年5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文明基石: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	1
第一节	爱玉崇玉的文化传统	1
第二节	似石非石的古玉概念	6
第二章	器以载道:古代玉器的主要器型和用途	11
第一节	礼器类	11
第二节	佩饰类	21
第三节	丧葬器类	33
第四节	陈设品类	36
第五节	玉用品类	41
第三章	走下神坛:古代用玉传统的变迁	46
第一节	巫神玉时代	46
第二节	礼玉时代	51
第三节	祈玉时代	53
第四节	赏玉时代	60
第四章	魔道博弈:真伪古玉辨识	71
第一节	古代玉材	71
第二节	古玉断代	84
第三节	玉质的现代科技鉴定	105
第四节	古玉辨伪	110

主要参考书目	125
附录	
历史上的食玉之风	127
商周玉器中的龙纹虎纹辨识	149
关于汉代玉衣和玉棺的几点思考	157
插图索引	167

文明基石：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

在中国古代工艺品中，玉器颇为独特。晶莹透明的水晶，色红如火的玛瑙、艳绿欲滴的翡翠、洁白滋润的羊脂玉、金黄熠熠的琥珀、天蓝瑰丽的绿松石、乌黑闪亮的煤精……玉的绚丽斑斓色彩和温润纯洁的质地，即使未经雕琢已极具审美价值，令人喜爱不已。但在许多古玉的器形和纹饰中，往往又弥散着浓厚的巫术与原始宗教的气息，有许多令人难解的千古之谜。玉既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这双重的因素使中国古代玉器显得神秘莫测，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充满着诱人的魅力。

数以千年，中国人爱玉、用玉之风一直长久不衰，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玉的天生丽质，即玉本身的质地和色彩的天然之美，引发了古人对玉的神秘功能的丰富遐想；另一方面，也在于玉的人文的因素：除了玉器的优美造型和精致的纹饰之外，还有那长期以来玉被赋予的文化内涵，它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第一节 爱玉崇玉的文化传统

一、玉与礼制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人类跨入文明社会门槛的物化表征主要为青铜器生产、文字产生和城市的形成，这些作为西方文明形成的标志，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礼”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中，最具

特色、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内涵,既不是文字,也不是城市,不是青铜器,不是宗教建筑,而是“礼”(或“礼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和礼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

礼是古代王朝统治者治理国家、维护等级制社会秩序的准则。它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抽象概念,通过礼制、礼仪及其载体——礼仪用器来体现。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作为礼与原始宗教的载体,具有突出的意义。在文字出现之前的中国史前社会,礼主要是通过礼器来表现,礼器是祭神、祭祖礼仪的法器。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原始先民们用玉器作为祭祀的法器。因此可以说,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史前时代,玉器是礼的观念的主要载体,它与礼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礼的起源,学界有各种说法,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礼源于“风俗说”“人情说”“祭祀说”“礼仪说”和“交往说”等^①。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吸纳东汉大儒许慎和郑玄对礼(繁体字作“禮”)字解说的基础上,通过对商代甲骨文“禮”字的考证,认为礼源于祭祀。繁体字“禮”右边的“豊”,甲骨文意为在豆(盘)中放置两串玉,左边配上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示”字偏旁,这样,“禮”字就是表达用玉祭祀的意思(因“示”字的本义是在高土台上放置着进行祭祀活动的法器)。王国维认为古者“行礼以玉”,“……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②。郭沫若认为从“禮”字的结构上来说,礼是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为对人以及敬神仪制^③。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认为,甲骨文“豊”字的下半部分

① “风俗说”见刘师培:《古政原始论》之十《礼俗原始论》,载《刘师培全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人情说”见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导言》,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

“祭祀说”见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排本,第96页;

“礼仪说”见杨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

“交往说”见杨向奎:《礼的起源》,载《孔子研究》1986年创刊号。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第2册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排本,第96页。

不是“豆”，应释为“鼓”。鼓是我国最早的礼器之一，因而“禮”字初文也就以这种礼器的形状所构成。“禮”为会意字，意即古人在鼓乐声中以玉来祭享天地鬼神之状^①。裘先生虽不认同王国维先生对甲骨文“豆”字的辨识，但并不否认“禮”字反映与玉事神的关系。

从礼起源到礼概念正式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伴随着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礼文化逐渐走向成熟，“礼”成为一个包含礼治、礼制、礼仪和礼器在内的集合概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作为祭祀法器的玉器使用者为巫师或氏族部落首领（巫与部落首领往往同为一入），玉器同时也就成为权力、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中国史前时代的玉礼制是夏商周三代礼制的源头。

二、灵玉崇拜

古人对玉非常崇拜，把它视为一种十分神奇的东西，具有沟通天地、昭示祥瑞、驱除邪恶和保佑人生的奇异功能。这在先秦至汉魏时代的古文献中都有不少的记载。

古人认为玉是山野中的精英，得天地之气，“钟山、昆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得天地之精也”（《淮南子》）。山中有了玉，就会使阴阳协调，树木生长，使自然界充满生机。“玉在山而木润，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阴中之阳也，故胜水；玉者，阳中之阴也，故胜山”（《大戴礼》）。古人相信人若与玉接触，也会阴阳协调，生理机能旺盛，有利于生命的延长；若用玉来陪葬，则能保尸，“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葛洪《抱朴子·内篇》）。所以，周代以来，丧葬玉流行，到汉代，皇帝和贵族死时竟穿玉衣作殓服……

古人认为玉有特殊的灵性，能与神灵相通，把它作为沟通人世间生灵与天上神灵的法物，“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周礼·春官·大宗伯》），定期地用与天地四方相配的各色玉——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向天地及东、南、西、北各方位神献祭，反映了

^①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古人对神灵崇拜的理念。

古人还认为食玉可以长生不老。“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葛洪《抱朴子·内篇》)。两汉魏晋时代,伴随着方术道士杜撰出来的一个个得道成仙的弥天神话,在弥漫着炼丹求仙的重重烟雾中,人们的食玉之风达到了高潮。

古人还相信玉是祥瑞的象征,能驱赶凶邪。帝王公卿用瑞玉,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而百姓用玉,则能带来好运,免祸保平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对贾宝玉“通灵宝玉”的描写,把古人对玉的神灵效应的迷信,发挥得淋漓尽致。

今天,在很多佩玉的人当中,虽然并非人人都相信玉真的能带来什么好运,但也有不少人怀有祈求吉祥的心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见,古代对玉的这种崇拜,至今已演变为一种积淀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民间习俗。

三、君子以玉比德

古人除了对玉赋予的种种奇异功能之外,还将玉作为人的道德品性修养的楷模。“君子比德于玉”,即将玉的自然属性人格化,简称“玉比德说”。“比德说”是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自然美观念。“比德”是指自然物象之所以美,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比德”,从中可感受到某种人格美。这里的“德”指精神品德,“比”意指象征或比拟。“比德说”是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的某种道德情操,使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人格化,人的道德品性客观化。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有一些涉及“比德”的言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孔子。孔子论及“比德”的主题,有以山比德,以水比德,以玉比德,以松柏比德,以土和芷兰比德等,而以玉比德之说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

古代文献中“玉比德说”最有代表性的文字是孔子回答他学生的一段话:“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

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礼记·聘义》)孔子以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基础,从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十一个方面对玉的内涵作了人格化的分析,强调玉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外表的美,更在于其内涵与人的精神世界彼此相通。正因为古玉被赋予如此的道德内涵,故“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礼记·玉藻》)。“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比喻道德品性修炼的过程如同美玉的磨砺,君子是要像经过切磋、琢磨美玉一样的磨砺功夫,才能获得高贵的品性。“君子温润如玉”,真正的君子外表谦和,内心刚直,小利不争,大事不让,又始终保持善解人意的风范,配得上美玉的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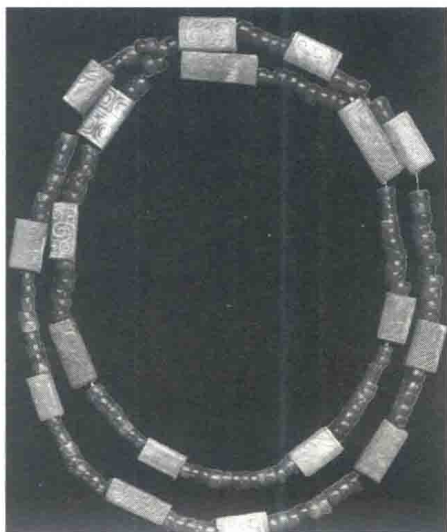


图1-1 西周玉项饰

孔子关于用玉来表示人的品德和人格的观点,奠定了后世文人对玉的情感和理念。以玉作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并且用佩玉来提醒君子时时注意德性操守,不要逾规,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到汉代,一些文人士大夫不仅继承了“玉比德说”,还进一步把它精微与阐发。贾谊在《新书·道德说》中曾说,“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扬雄在《扬子法言·君子》中直言“君子似玉”,“纯沦温润,柔而坚,玩而廉,队乎其不可形也”。东汉大儒董仲舒在《白虎通》中进一步综合了前人的理念,将玉强调为公侯以玉比德。刘向在《说苑·杂言》中将六理归纳为六德,“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于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闻远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

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将孔子对玉内涵的人格化分析更为简要地概括为“五德”说。孔子的“玉比德说”经过汉代儒家的传承和发展，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产生着影响。

古人把玉比作修身养性的标准，把玉当作反映美德的镜子，其坚致象征智慧，其圆润象征纯洁，其瑕疵象征真诚，“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名言，道尽了古代贤达之士对道德信仰的执着追求。

今天，以玉比德的风气早已淡化，但仍有一部分人依然把佩玉视为一种有道德修养和文化品位的表征，反映了儒家玉道德观的深远影响力。

第二节 似石非石的古玉概念

我们在鉴赏古代玉器之时，常常会发现不少古玉器的色泽和质地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纯洁美丽，有些硬度不高，也缺乏透明度，甚至还像某种石头之类的，这是为什么？这涉及古人和今人对玉的概念的不同理解。从史前时代到汉代，古人对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广义的玉概念到狭义的玉概念过程，中间还包括广义玉与狭义玉概念并存的时期。

一、广义的玉

远古时代，先民们对玉的理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科学，完全是凭感觉而论。颜色美丽，质地温润而有光泽，具有一定硬度的矿物，就把它视为玉。我们根据对考古出土物的古玉器分析，发现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代，古人心目中的玉其实是一个群体，不仅有和田玉为代表的软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孔雀石、绿松石、玛瑙、水晶、琥珀和大理石等多种矿物。这在今天看来当属于广义的玉。

有学者认为，“玉是远古人们在利用选择石料制造工具的长

达数万年的过程中,经筛选确认的具有社会性及珍宝性的一种特殊矿石”^①。从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辽宁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迄今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最早玉器,到此后东北和内蒙古的红山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



图 1-2 西周玛瑙珠管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及岭南的石峡文化、台湾的卑南文化等全国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来看,其材质主要为角闪石、蛇纹石、玛瑙、玉髓、绿松石等,还有水晶、煤精、独山玉、萤石与滑石等,其中既有质地细腻、硬度较大的矿物,也有硬度不大,但色彩美丽、有一定透明度的矿物。这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先民观念中的玉是某些美石。在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和辽宁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除了有玉斧等生产工具外,还有玉匕、玉珕等装饰品,尚未见到用于祭祀或其他社会意义的玉器。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古人对玉的社会性与珍宝性认识,可能是“珍宝性”出现在先,“社会性”出现在后。

夏商周时代,古玉的社会功能扩大了,古玉的种类和用途也增加了,作为生产工具的玉器逐渐退出,而作为生活用品、装饰品的玉器增加了,尤其是用作各种祭祀和礼仪活动场合的玉器大量增加,反映了等级森严的奴隶制时代玉的社会功能主要是“权力化”和“礼制化”。在夏商周时代,各种玉器的材质依然以角闪石、蛇纹石、绿松石、玛瑙四大类为主,但用作服务于维护王权统治的祭祀、礼仪之玉,则主要是角闪石和蛇纹石类。尽管如此,夏商周时期的古玉还是象征权和礼的美石,属于广义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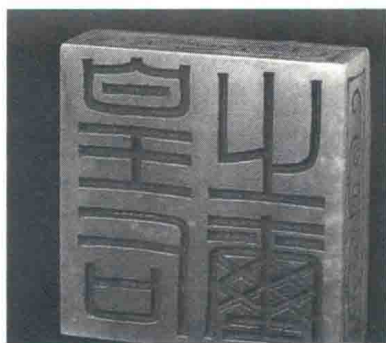
^① 杨伯达:《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二、狭义的玉

春秋战国开始到西汉,是玉概念由广义向狭义过渡的时期。从春秋初期管仲提出的玉有“九德”^①,到春秋晚期孔子对子贡问为何人们“重玉轻珉”的原因解释看,对应比喻的都是和田玉为代表的角闪石玉,说明春秋时期是我国出现狭义玉概念的萌芽期。古玉从“象征权和礼的美石”向“象征礼和德的美石”转变。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战国时代贵族墓中所见玉器中许多都为和田玉材质可知,战国时代在中原地区和楚国的贵族中,以和田玉为代表的角闪石玉已经成为主流玉材(尽管还经常掺杂着一些地方玉料)。在西汉时期大量王公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中,和田玉中的羊脂白玉已不少见,反映了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玉概念已由广义向狭义过渡。至少到东汉,古人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狭义玉概念。



A(印纽)



B(印面)

图1-3 西汉皇后玉玺

① 管仲《管子·水地》：“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转彻远，纯而不杀，辞也。”用白话文解释，那就是：玉之所以可贵，是因其有九种品德。温润而泽，是其仁；清澈而有纹理，是其智；坚硬而不屈缩，是其义；清正而不伤人，是其品节；清明而不垢污，是其纯洁；可折而不可屈，是其勇；优缺点都表露在外，是其诚实；华美与光泽互相渗透而不相侵犯，是其包容；敲击发音清扬远闻，纯而不乱，是其条理。《诸子集成》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236页。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玉”曰：“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偪理自外，可知其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传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絜之方也。”许慎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概括玉的内涵特征，“美石”是自然属性，“有五德”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是人为赋予的。天然的美石具备了可被称为玉的前提，但如果不同时具备“五德”，则天然美石就不能算玉。我们看到今人的有些文章中，常有曲解许慎对玉解释的含义，引用《说文解字》解释玉概念，光讲“石之美”，省去了“有五德”，成了“美石皆玉”。汉代儒生所谓的“五德”，系在管仲的“九德”、孔子“十一德”的基础上简化概括而来。孔子将玉的“温润而泽”“缜密以栗”“廉而不刿”“叩之其声清越以长”“瑕不掩瑜”等物理表象，比附于君子的德性，说明春秋时代贵族已经注意到玉的一些物理特性，而具备“五德”这些特征的矿物，正是角闪石类矿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软玉。至晚在商周、春秋战国、秦汉时，作为角闪石玉主体的新疆和田玉已经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结合今天从商周、春秋战国到汉代墓中出土的玉器，我们发现有不少是软玉质材。由此可以认为，许慎所指的具备“五德”的美石，已经从广义的玉中独立出来，专门指角闪石玉。

在汉及汉以前的古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玉器及玉材的记载，如《山海经》中记载的玉料产地就有 250 多处。《尚书》《尔雅》等也都提及古代玉料的产地。许慎《说文解字》中，“王”字偏旁的字有 100 多个，都与玉有关。除了各种古玉器的名称以及以玉比喻各种美好的事物之外，还有各种不同产地的玉料名称（如“珣、琪”为东北地区的“夷玉”，“球、琳、琅、玕”为西北地区出产的玉料，“瑶、琨”为江南地区的玉料），有“石之次玉”，有“似玉之石”，有不同颜色之“玉”。《说文解字》中涉及的玉，绝大部分属于“石之美者”的广义玉。

汉代人如何分辨角闪石玉和其他美石？从外观上观察其色泽和透明度仅仅是一方面，汉郑玄注《周礼》曰“玉多则重，石多则轻”，唐贾公彦疏“玉方寸重七两，石方寸重六两”。可知古人从玉的物质属性方面来区别玉与石，玉和石的重量与其质地有密切关系，古人已知

道这里面的关系,但尚未能如现在这样用科技手段测出玉石的主要成分(质地)。

三、现代的玉概念

现代矿物学和工艺美术界将古玉分为宝石(金刚石、红、蓝宝石和祖母绿等)、玉石(软玉和硬玉、硅酸盐类矿物)和彩石(蛇纹岩、钙长石、石英、细粒大理岩等)三类。按现代的矿物学标准,中国古玉中有许多是不能算作玉的。但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测试。结果表明,这些玉器采用的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硬度为6.0~6.5度,属于软玉;辉石类硬度为6.75~7.0度,属于硬玉。角闪石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因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纯者色白,色泽较近于凝脂美,犹如凝结的羊油,故人们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辉石类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钠和硅酸铝,质地坚硬,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其典型色泽有翠绿、苹果绿、雪花白及娇嫩的淡紫色。其中,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有“翡翠”之雅称。

辉石类是在18世纪后才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的,此前极少见,明代定陵中所见翡翠如意为中国所见最早的翡翠制品。所以,中国古代玉器的传统玉料主要为角闪石(即软玉)和其他彩石。